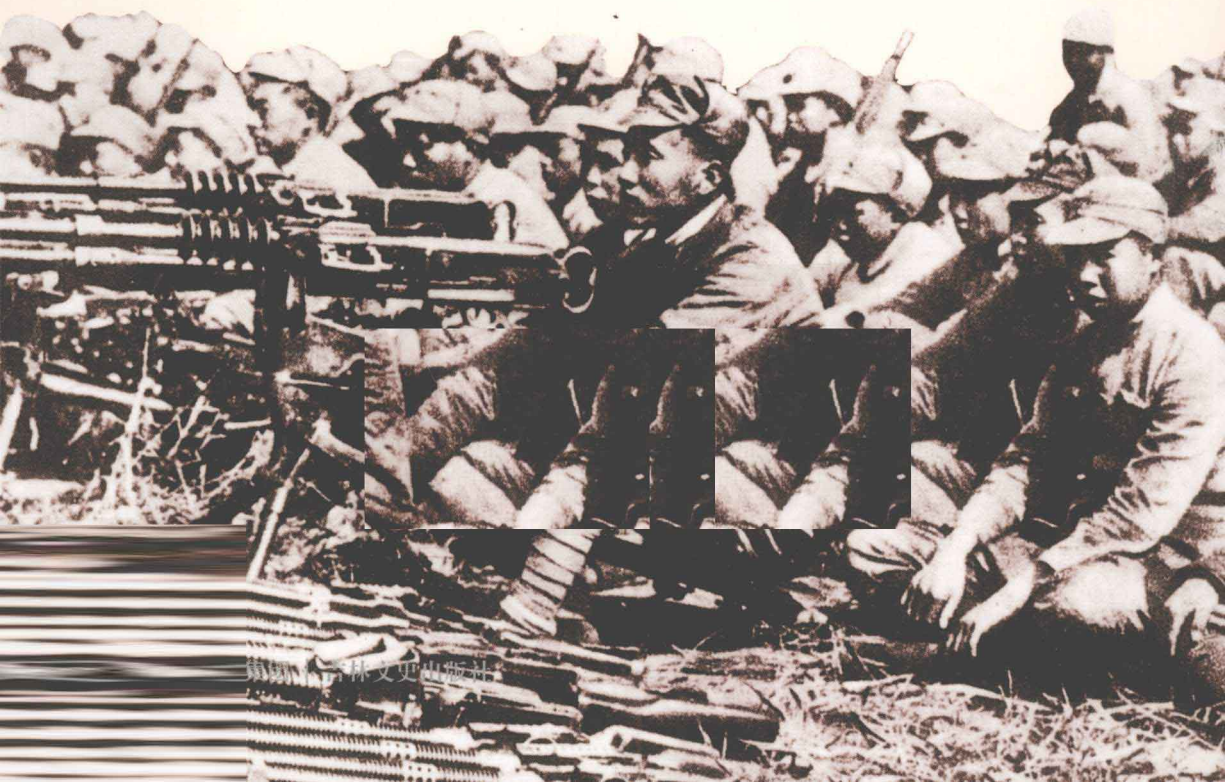


红流纪事

同室操戈

皖南事变

武国友/主 编 冯晓春/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同室操戈：皖南事变/武国友主编.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3

(红流纪事)

ISBN 978-7-5472-0488-7

I. ①同… II. ①武… III. ①皖南事变(1941) — 史料 IV. ①K265.2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3399号



红流纪事

同室操戈

皖南事变

TONGSHICAOG
WANNANSHIBIAN

主 编/武国友

著 者/冯晓春

出版人/徐 潜

责任编辑/康迈伦

责任校对/李洁华

装帧设计/柳雨泽 徐 震

印装/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mm×1000mm 1/16

字数/75千字

印张/8

版次/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联系电话/0431-86037516 13578885062

www.jlws.com.cn

书号/ISBN 978-7-5472-0488-7

定价/16.00元

丛书主编/武国友

副主编/王绍强 陈毓述 史义军

著者/冯晓春

编委会

主任/武国友

副主任/程舒伟 鲁晓红 王绍强

委员/周振华 赵丽君 杨兴朝 徐连英

智金华 殷明星 任曼劼 杨燕华

吴宝林 张宇英 马 铃

总 序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走过了长达28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继承、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缅怀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我们组织编写了《红流纪事》丛书，以志纪念。

近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各类党史著作数以千计。但在已出版的著作中，将一些重大事件独立写成本综合性的小册子，合起来形成一套丛书，目前尚不多见。将中国革命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融合在一起，以此为骨架来展现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选择中共党史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需要做些筛选。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很多，我们这套《红流纪事》丛书所选之“重大事件”，只选择了民主革命28年历史当中30件大事，力求通过这30件大事大体上涵盖中共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这首先就遇到了选取哪些事件最为合适的问题。就我们的水平而言，很难说就一定能够选得那么准确、恰当。但总体设想是，应以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业为主，有的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经验或教训。

在选取事件的过程中，除以上一些考虑之外，经过反复综合、权衡，觉得还应有下列标准：一是体现重要性。也就是说，所选事件要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有重要影响。二是注重代表性。所说的代表性，就是某件事可能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影响并不是很大，但考虑到它可能是代表某一方面的，对这样的事件也选取了一些。三是注重平衡性。所说的平衡性有两层意思：其一，处理好事件与事件之间的

交叉。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事件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因受事件独立性的限制，相互之间必须避免重复。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撰稿过程中，通过详略取舍的办法作了一些处理。其二，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中共早期组织，工农运动、军事斗争，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各苏区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各大战役，等等，都有所选取，尽量照顾到方方面面。尽管作了上述一些考虑，但由于每一小册子都是以某一事件为中心独立成册的，所选事件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已出版的党史书籍。通过参考大量文献资料和已有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直书。严格地说，这套书还不算是一套学术著作，而是一套近乎通俗性的读物。努力做到既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又力求文字朴实、通俗易懂，是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初衷，但由于时间和水平所限，目前这套丛书与我们的初衷还有一定距离，与读者的期望还会有很大差距，我们在此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给予谅解。当然，也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在此，我们向所有关心此书的同仁、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编者

2011年3月于北京



挺进皖南

(一) 组建新四军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日的建议。经过两党谈判，最终达成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湖北汉口成立。

叶挺任新四军军长，项英任政委兼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政治部副主任。

叶挺，原名叶洵，字希夷，祖籍广东兴宁。1896年9月10日生于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初任粤军某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叶挺率部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宋庆龄安全脱险。1924年，叶挺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后任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中，叶挺率部参加了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的美誉，第四军被称为“铁军”。北伐军占领武汉后，部队进行扩编，叶挺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1927年12月，叶挺到广州参加并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起义失败后，叶挺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1933年11月，叶挺来到福州，帮助蔡廷锴、蒋光鼐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事变”失败后，叶挺在香港加入了李济深、陈铭枢等组织的以抗日为主旨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项英，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江俊、张成。1898年5月生，湖北武昌人。1913年进布厂当工人。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湖北

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参与领导了1923年2月平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1925年2月沪西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1926年秋起，项英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项英来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项英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7月，项英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随后，项英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5月，代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项英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一起，带领红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留在江西掩护红军主力转移。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了高度评价。新四军组建后，项英任新四军政委兼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

新四军分会书记。

周子昆，190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贫民家庭。1919年从广西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因生活所迫，参加了桂系军阀刘震寰的部队。周子昆目睹了军阀部队的腐败，不愿同流合污而向往革命。1925年，周子昆参加革命，加入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周子昆任叶挺独立团排长。1926年，周子昆参加北伐，在汀泗桥、贺胜桥，以及攻打武汉三镇的战斗中显示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先后晋升为连长、营长。1927年8月，周子昆率全营参加南昌起义，跟随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1930年后，周子昆历任红军支队长，红三军参谋长、军长，红五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福建军区总指挥，独立二十二师师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赣州、南雄水口等重要战役的战斗。1934年10月，周子昆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周子昆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参与组织指挥了军团部队四渡赤水、二战遵义城、抢攻娄山关等战斗。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中共中央确立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周子昆调任红五军参谋长，参加了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行动。同年9月，张国焘违抗中央指示，擅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并召开会议，攻击中央北上方针，强迫周子昆等人表态，周子昆旗帜鲜明地坚持北上，反对分裂。新四军成立后，周子昆任副参谋长。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移至江西南昌。全军有1万余人，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

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二）进驻云岭

1938年2月，南方8省13个边区红军游击队到皖南岩寺集中。4月4日，军部从南昌出发，4月5日到达安徽歙县岩寺。随后，第一、第二、第三支队7000余人陆续到达，分别驻扎在岩寺地区的潜口、西溪南、琶塘村。

岩寺镇位于黄山中部，是徽州区府所在地。境内地势平坦，低山丘陵环抱，丰乐河在此穿过，为屯溪、歙县至黄山的必由之地，是黄山天然的南大门。晴天，北向远眺，黄山诸峰，岚拥云海，重峦叠嶂，景色秀丽。唐朝初期建村，只有百余户人家。村前山岩上有一座寺庙，称岩寺，寺内僧侣数百，香火极盛。因寺闻名，公元766年改村为镇，护持寺院。公元1132年，改岩寺镇为岩镇。明、清时期岩寺镇已经非常繁华了，被形容为“鳞次万家，规方十里，闾閻蝉联，百昌辐辏”。而且，文教昌盛，书肆、墨坊闻名通逸，学者、显宦相继涌现，如状元唐皋、文学家吴定、戏剧家潘之恒、制墨家方于鲁和程大均、经学家金榜等一大批名人。镇内有一座著名的塔，称为文峰塔。南面有一座凤山台，台上原有三榭，中间一榭供奉佛像，左右二榭供人憩息。大门上方写有“凤山灵境”四字，中榭悬挂着“中天绩翠”匾额。叶挺、陈毅曾登台阅兵，所以，又被称为“点将台”。1938年，南方8省游击健儿在这里集结成军。当时曾流传着“北有延安，南有岩寺”之说。岩寺是新四军的整编地、集结地和

出征地。1981年9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将岩寺列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旧址被修复,1999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四军军部五处旧址之一。

新四军在岩寺集中,主要是接受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点验,加强军政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配合当地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军部设在岩寺荫山巷金家大院。该院是一组清末徽派古民居建筑群,包括四幢三间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及前后院落,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军部机关及其警卫排、军需处、参谋处等机关设在军部附近的百姓家中,其机要科及电台设在军部以东百余米的洪桥。此桥建于明成化五年,也就是公元1469年,为一座结构精巧的廊桥。军部移到这里后,叶挺经常在桥廊与群众交谈。

新四军在岩寺集中整编前后不过3个月,但在新四军建军史上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新四军从一支分散的游击队向正规化武装转变的完成。1938年4月26日,新四军召开抗日誓师大会。两天后,新四军先遣部队从潜口出发,拉开了东进抗日的序幕。8月2日,新四军军部进驻安徽泾县云岭,属黄山余脉,海拔500余米。三面环山,一面依水,风光如画。叶挺曾赋诗赞颂这里的美丽风景:“云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悬崖君试看。千里江淮任驰骋,飞渡大江换人间。”到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这里驻扎了两年半。部队从2万人发展到9万多人,因此,人们把云岭称为“新四军的摇篮”。

陈氏宗祠是新四军军部大礼堂旧址,由3个大厅组成。建于清代康熙年间,是泾县最大的祠堂之一。前厅里建有舞台,系木板结构,是

当年新四军开会作报告和表演节目的地方。司令部设在罗里村，由种墨园和大夫第庄园组成。这里有一栋楼房、一座花园和几十间平房，环境优雅，造型古朴。内设参谋处、作战处、秘书处、机要科。叶挺、项英、周子昆的办公室、卧室都在这里。

（三）周恩来云岭之行

1939年2月16日，周恩来从重庆出发，前往云岭。当时，叶挺也在重庆，他陪同周恩来飞抵桂林。2月18日这天正好是农历大年三十，周恩来和叶挺乘火车途经长沙，然后转道江西。在樟树改乘汽车前往吉安，接着去上饶。在这里，周恩来会见了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随后，他们经江西东北部前往皖南。2月23日，周恩来从太平麻村兵站骑马至三门、湘潭，又改乘竹筏沿青弋江东下，于当天下午到达章渡，受到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曾山、李一氓和机关直属人员的迎接。陈毅、粟裕得知周恩来到达云岭，也从苏南赶到那里。

周恩来抵达云岭之后，就忙着进行调查。除了听取新四军领导同志的汇报外，还找各支队负责同志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他还到机关、医院、连队和抗大分析了解部队的生活、学习和训练情况。周恩来此行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当时，新四军已经有一部分兵力深入苏南，张云逸率部去了江北。但是，新四军依然处于不利的态势。其主力布置在皖南，长江沿岸被日军占领，背后又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左右有国民党军队布防。活动区域只限于东起芜湖和宣城，

西至青阳横宽 100 公里、纵深不过 50 公里的狭长地带。一旦遇到不测事件的发生，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3 月 6 日，周恩来在军部大会堂向新四军排级以上干部和东南局与军部人员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新阶段的中心问题是在敌人占领区，在中国的东部，在黄河以东、平汉铁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东部被日军占领了，更主要的是，这里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地区。在这个地区开拓抗战新局面，是新四军的重大责任。新四军就处在中国东部，这个客观环境恰恰使新四军的地位得到提高，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周恩来鼓励新四军克服各种困难，大胆地到敌人后方去。他提出新四军在敌后发展的 3 个原则：1. 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2. 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 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周恩来告诉大家，在同民族敌人作战的时候，大江南北游击根据地的创造是完全可能的。

周恩来到云岭需要解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叶挺同项英的关系。新四军创立后不久，蒋介石要求新四军出南陵，依托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活动。项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而叶挺认为是可行的。1938 年 4 月 18 日，项英致电中央，说叶挺同蒋介石交涉不能解决问题，想撇开叶挺由他本人同蒋介石打交道。但是，中央没有同意，并且认为叶挺的意见是可行的，新四军不妨出南陵。5 月 4 日，毛泽东电告项英，要他同叶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项英没有听从中央的劝告，同叶挺

的关系没有什么改善，对叶挺处处冷淡，甚至连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告诉他，以致叶挺在新四军无法待下去。1938年8月，叶挺表示要辞职。周恩来到达云岭后，向军部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叶挺的意见，并多次找项英谈话，对他提出批评，劝他同叶挺搞好关系。尽管项英作了自我批评，但事实上并没有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依旧没有得到改善。

在云岭期间，周恩来还在中村乡石头尖村召开地方党员干部会议，把400余册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小册子发给到会的党员干部。周恩来在云岭军部工作了3个星期。3月14日，周恩来和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刘九洲，以及从军部调配的速记员方卓芬、吴博一行，在粟裕、张云逸带领的警卫排的护送下，离开云岭，经章渡、三门，于3月16日到达屯溪，3月17日到达金华，然后经绍兴、湖南衡山、广西桂林等地，于5月1日返回重庆。

（四）外国记者的云岭情结

云岭作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吸引了不少外国记者和进步人士。1938年11月，美国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以国际红十字会记者的名义，从重庆来到云岭访问。项英向史沫特莱详细介绍了新四军的历史和发展、在敌后开展游击队战争、利用战斗间隙进行训练、培养干部等方面的情况。项英特意提到教导总队有个女生队，有100多人。她们当中，有些还是红军，大多数来自江南敌后，都是有知识的爱国青年，抗日热情很高，学习非常努力，军事操练认真。

史沫特莱很感兴趣，表示要去看一看。在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的陪同下，史沫特莱来到女生队采访，女生队队长于晶向史沫特莱介绍了女生队的训练方针、内容、方法和生活情况。史沫特莱察看了女生队的宿舍、操场。当她看见学员们坐在草垫上，把书本放在膝盖上，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时，她很受感动。史沫特莱发现有些学生手上生出疥疮，就问于晶：“学员们经常洗澡吗？”于晶回答说：“天热的时候好办，就在河里洗澡，天冷时缺少用具，缺少燃料，只能少洗或者不洗了。一个班10多个人，睡在一张大铺上，又不能经常洗澡，生疥疮就难免了。”史沫特莱把她的参观记事和学员们持枪操练的情景拍成照片，寄给美国进步刊物和上海《良友》画报发表，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宣传新四军女战士的风采。史沫特莱还将她的一部分稿费捐赠给女生队，帮助她们修建了淋浴室，解决了女战士天冷时的洗澡问题。

在云岭期间，史沫特莱还救了一位放牛娃的命。1939年7月的一天，4架日军飞机偷袭云岭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罗里村，大家都躲进了防空洞。这时，有个放牛的孩子被飞机吓呆了，不知所措。史沫特莱发现后，立即丢下手里的打字机，奋不顾身地跳出深沟，一把抓住放牛的孩子往壕沟方向跑。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一枚炸弹，炸死了那头牛，军部一座小楼的后墙也被炸塌了。

1938年12月，美国《大美晚报》记者杰克·贝尔登随上海民众慰劳团来到云岭，多次采访了项英。回到上海后，贝尔登在《大美晚报》上连续发表了10多篇报道，介绍了在云岭的所见所闻。贝尔登称赞新四军是抗日的模范，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敌，是中国未来的希望。贝尔

登还在《大美晚报》上发表了他在新四军驻地拍摄的战士操练、讲演、慰劳团活动等情形的照片。后来，贝尔登又将他在《大美晚报》上发表的10多篇文章整理成单行本，取名《新四军》，由大美晚报社出版。

1939年，德籍著名记者汉斯·希伯以美国太平洋学会《太平洋事务》月刊记者的身份来到云岭，采访了周恩来、叶挺、陈毅，后来又随新四军军部采访了陈毅、刘少奇。在苏北，希伯完成了一本8万字的书稿《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还撰写了大量报道，向全世界介绍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

加拿大护士琼·尤恩在《曼彻斯特卫报》上阅读了史沫特莱的报道，得知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充满苦难的战争，特别是在收到史沫特莱呼吁医护人员前往中国的油印信后，她千方百计要求到中国参加抗战。经加拿大共产党的介绍，琼·尤恩来到纽约，找到了美国共产党和加拿大共产党共同组成的“援华委员会”。她被安排在白求恩医疗队里，并担任白求恩的翻译和助手。1938年2月，琼·尤恩随白求恩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同年12月，琼·尤恩回到上海。应新四军的请求，她答应帮助募集药物并送往新四军驻地。1939年元旦刚过，琼·尤恩一行从上海出发，将募集到的药物和医疗器械运抵泾县小河口新四军后方医院。随后，她来到云岭。在云岭期间，尤恩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新四军培训医务人员，治疗伤病员。在新四军后方医院，她协助新四军的医生给伤员做手术。她还和史沫特莱一起，进行了新四军中第一例尸体解剖。对此，琼·尤恩感到非常自豪。项英会见了尤恩女士，对尤恩女士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尤恩女士给予新四军的无私援助，表示

衷心感谢；特别对尤恩女士准备帮助新四军医务人员，大加称赞。1939年夏天，尤恩在返回加拿大之前，叶挺专门为她送行，感谢尤恩为新四军的伤员所做的一切，并说他和他的战士永远都不会忘记琼·尤恩。

（五）云岭保卫战

1940年10月2日，日军第十五师团及一一六师团各一部，加上伪军，共1万余众，组成步、骑、炮、空联合兵种，在三木石太郎的指挥下，向皖南进犯，企图“围剿”云岭。当时，驻守皖南的新四军部队只有7000余人，分布在泾县、南陵、繁昌、铜陵等地。10月6日下午，日军步兵5000余人、骑兵800余人，携炮20多门，向云岭发动进攻。在空军的配合下，日军骑兵在前面开道，步兵、炮兵紧随其后，气势汹汹地向云岭扑来。驻防南陵峨岭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一枪未发便逃之夭夭，使日军得以长驱直入。此时，驻云岭的新四军部队不足600人，其余部队还在中村、茂岭等地。叶挺、项英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当前的敌情，研究作战部署。叶挺建议，鉴于日军大队人马沿公路推进，我军应在日军来犯的必经之地设置纵深阵地，采取层层堵截、相机反击的积极防御方针，消耗并战胜来犯之敌。10月7日，日军攻占了南陵三里，随即以5000人的兵力分3路向南进犯，企图攻占云岭。当晚，日军攻占了泾县汀潭。新四军老一团一营一连在左坑与日军进行血战，消灭敌人近100人。8日凌晨，汀潭残敌在炮兵的掩护下攻占了大岭。新四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新一团、老一团在枫坑四周山堵截敌人，把敌人打得抱头鼠窜。日军见久攻不克，从芜湖调集援兵。日军在10多架飞机的掩